变迁中的社会与个体生命

——以我国东北地区研究为例

谢 雯*

【摘 要】从 21 世纪初开始,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就处在一个艰难的转型期。如何振兴东北已多次引发学界和政策界的讨论,然而东北地区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使得纯经济学的考量屡屡失效。整体性的社会学思考与分析框架能够帮助学界更加充分地理解东北地区的转型以及当下的社会文化特征。本文通过回溯笔者在博士论文写作中有关东北地区研究的提问、田野调查以及理论化过程,对社会变迁的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在研究处于快速变迁中的社会时,本文主张结合生命史研究方法与宏观历史分析,将人的精神气质的变化与社会结构、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变化联系起来。最后,本文提出,这样一种对于地域社会文化特征的动态社会学分析,对产业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模式选择均有着重要启示。

【关键词】个体生命;社会变迁;东北地区;质性研究方法

20 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迁,这一系列变迁在为社会学家们提供了诸多亟待考察的研究问题的同时,其复杂性也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近代东北地区的社会变迁是理解 20 世纪中国的重要线索,并且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曾以多种视角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贡献了讨论东北问题的不同进路。笔者的博士论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介入讨论,旨在为东北地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变迁提供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本文回溯了笔者在博士论文中关于东北地区研究的思考出发点、田野进程以及对于经验和理论谜团的反复打磨过程,对现有的针对社会变迁的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并主张将生命史研究方法与历史分析结合起

* 谢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世代与社会变迁,wxie@pku.edu.cn。

引文格式:谢雯. 2022. 变迁中的社会与个体生命——以我国东北地区研究为例[J]. 公共管理评论,4(3): 157-165.

Cite this article: Xie W. 2022. Individual lives in a changing society: Using Northeast China as an example[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3): 157-165. (in Chinese)

来,探究社会结构巨变中的深层社会底蕴和人的道义世界的变迁,重新审视东北地区跨越时代的社会转型。

一、从社会学出发的东北地区研究

国内外的社会学家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关注与写作集中在 21 世纪初。当时从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劳动制度改革、劳工抗争、下岗工人再就业、城市贫困的经验材料出发,涌现了一批优质的研究(李培林和张翼,2003;刘平,2004;田毅鹏,2004;Lee,2007;孙立平和郭于华,2010;吴清军,2010)。而在 21 世纪初的研究热潮过后,社会学界关于东北地区的讨论稍显沉寂。而随着 2015 年开始东北经济再次出现警报,经济学界针对这一地区经济断崖式下跌和衰落的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热烈讨论。

综合既往学界和政策界关于东北地区的讨论可以看出:即使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似乎仍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症结,即所谓的“东北问题”。那么,如何定义东北地区现存的问题,以及如何对这个问题进行剖析,就成了推进讨论的核心。以经济学家为主的讨论在定义问题时,会集中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个维度上,在分析增速缓慢的原因时,往往会陷入“体制决定论”以及“产业结构决定论”这两类解释中。

“体制决定论”是一种自市场改革初期就已经存在的观点,其中暗含了计划—市场之间的二元对立,将市场发展不好归因为计划力量太强。由此,这类论点强调东北地区经济历史上的“原罪”:东北地区现在的发展问题,是历史上计划经济色彩太浓导致该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造成的(The Economist,2014;南都社论,2016)。而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计划—市场二元对立的假设,主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进而强调产业政策的重要性。林毅夫团队的《吉林报告》从产业结构出发,将东北地区的核心问题定位为“产业错位”,强调“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才是“体制固化”形成的根本原因,并直接造成了东北经济的脆弱。因此,东北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找准工业区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吉林课题组,2017)。尽管经济学家对于到底是应该扬长“避短”还是扬长“补短”争论不休(林火灿,2017;王红茹,2017),但大体都将东北地区的发展问题理解为如何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

经济学模型往往追求简约,但东北地区过去 70 年的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却使得纯经济学的考量屡屡失效。“体制决定论”是去历史化的,仅仅强调了前 30 年的体制安排对于东北地区后续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却没有对于这一地区的近 40 年的市场改革发展做历史化的动态考察,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国企改革、单位制改革、产业改革、城市改革、福利制度改革等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并没有达到设想的效果。而“产业结构决定论”尽管将问题进一步聚焦到宏观的产业政策及其结构上,却无力处理地方社会中普通个体的生命活动的复杂性,因而在现实的推进中屡屡受阻。实际上,生活在东北的真实个体对于工作的理解、对于自己人生的规划以及对于未来

的想象,很难被假想的产业比较优势和分工结构完全决定。而脱离了对地方情况的充分考量,自上而下的产业结构再造以及分工的重新规划的成效究竟如何,不得不让人打上问号。

由此可见,引入对于地域社会变迁的整体性社会学考察便十分必要。那么,如何跳出已有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对东北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渐进性进行探究,便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对此,笔者首先从社会学中的历史社会学进路和过程—事件分析中获得灵感,对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事件(events)和转折点(turning points)予以关注。笔者最初的经验困惑(empirical puzzle)是一个历史社会学式的提问:为什么40年的市场改革并没有在东北地区产生契约化、科层化,以市场规则配置稀缺资源的经济社会?为什么东北地区作为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先锋,在市场改革过程中,却承接并延续了一系列类乡土的“熟人社会”的特点?^①在初访田野后,笔者将上述困惑落实为以下几个研究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市场改革初期的国有企业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大量工业组织解体、21世纪初开始的区域振兴,给东北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具体变化?在东北地区的过去70年中,制度与政策、产业结构、工业组织、社会行动结构以及普通人的精神气质之间是怎样的一个相互塑造的关系?以上便是笔者关于东北地区研究的思考出发点。

二、田野调查初期的摸索

如何才能将上述研究的想法落地?笔者一开始对田野工作的设想受到中文学术界经典民族志和芝加哥学派民族志研究的深刻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笔者都认为,社会学家如果不在田野扎根一年半载,做出的研究可信度都要大打折扣。因此,笔者一开始也想要去仿效经典的民族志研究来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但是,这样的尝试很快面临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田野点能够代表东北社会,并且能够回答笔者的研究问题?按照社区民族志方法的要求,理想的田野点应该可以提供东北社会历史变迁的缩影,如此一来,笔者可以通过深入观察这一社区,从中探求历史变迁对于社会深层底蕴和普通人的道义世界的塑造过程及结果。

阎云翔(Yan, 2003)在下岬村所做的民族志研究,可视作对东北农村地区进行民族志研究的一个典范。但要探求计划经济和市场改革这条历史主线对于东北社会的影响,田野的落脚点应该是在城市,最好围绕单位社区展开。那么笔者要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应该选取现存的、没有解体的单位社区,还是已经解体的单位社

^①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本色和“熟人社会”特质。如果我们将东北地区的社会文化特点看作费孝通笔下“熟人社会”文化脉络的历史延续,似乎也很自然。但是,一旦考虑到这一地区在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个体化这一系列变迁之后,仍然呈现出一系列“类熟人社会”的特点,这些不同的历史变迁逻辑之间的张力便需要进行更加深入且仔细的分析。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在研究和写作中会特别关注变迁过程中的社会结构与关系重构。

区?在田野调查初期,笔者曾经考虑过仍在运营的大型国企以及围绕这些国企而建的单位社区,比如鞍山的鞍钢、本溪的本钢、长春的一汽等,但最终并没有选择将这类现存的大型国企作为核心田野点。这主要是考虑到,在东北的整个产业经济结构变迁中,尽管这类保存完好的大型国企及其社区十分重要,但这类企业单位和单位社区从数量上来说只是一小部分,而大多数国企实际上在近40年的改革和社会变迁过程中消失了。仅仅关注这类保存下来的企业社区能够看到体制、特殊垄断行业以及超大型国有企业“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特性对于地方社会的持续影响,但却容易遮蔽工业组织解体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这一面向。

为了补上对于工业组织解体这一维度的考察,笔者首先将目光集中在沈阳市的铁西区。铁西区的大部分工厂在世纪之交关停并转,仅存的工业企业后来也搬到郊区,在变化维度上较好地代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消失这一历史趋势。但是,将铁西区作为田野点的问题在于,这一工业区作为城市的有机部分,自20世纪末下岗潮以来新陈代谢速度很快。经过“东搬西建”和城市建设,崭新的楼盘覆盖了曾经的厂址,新居民来到铁西区安家置业。曾经的下岗工人家庭中,儿女有购房能力的也纷纷将在铁西区居住的父母接出了老旧小区。简言之,以单位为中心组织的居住环境已经基本被打散。如此情况下,研究者很难通过观察某一特定社区,从而探究出长期以来的社会变迁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

在没有想到更好的研究方法之前,笔者仍然先在工业区中选择了三家大型工厂作为主要的材料收集对象。这三家大型工厂曾经隶属于机械行业和冶金行业,其中两家在21世纪初破产,第三家在关停并转过程中裁员9000多人,最后仅剩几百名员工维持少量生产。笔者围绕这三家工厂一共做了约60次访谈,并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采访了不同岗位的职工。同时,笔者在不同渠道搜集了关于三家工厂的书面材料,包括厂志、报纸报道、旧书网和旧书摊上能找到的散存材料、私藏家庭档案等等。根据这家工厂可得的材料,笔者初步回溯了国有企业改革、劳动制度改革等不同时期的政府政策变化,试图将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拼接起来。在这三家主要工厂之外,笔者在田野调查初期也对其他行业的一些工厂进行了类似的材料整理以及比较零散的访谈。

虽然田野工作在逐步推进,但笔者总是觉得上述依托于三家工厂的材料收集方式不是特别理想。在访谈和整理文献时,笔者的关注点不可避免地会进入这三家特定工厂的政策细节层面,逐渐过于集中在具体的组织内部。而这与笔者一开始所设想的对于一个地域社会的整体性社会学考察有些距离,但笔者又不知该如何突破。一次,笔者对论文指导委员会的老师提起了田野调查中的苦闷,指导老师听后尖锐地指出:笔者关注的工厂大部分已经解体,而想要去研究工厂解体后的社会底蕴的变化,这其实是想要研究一个“幽灵”。这个“幽灵”没有一个实体了,而怎么样通过田野的方式去研究一个不存在的、没有实体的东西,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指导老师建议笔者更换田野工作策略,考虑从地方上现存的工业企业以及保存更完好的单位社区入手,这样起码有个固定的实体,材料收集也会更加有的放矢。

指导老师的建议当然是有道理的,如果从材料可得性的角度出发,笔者应该去做出这样一个转变。但是当时笔者的考虑是,正如前面提过的种种原因,这样一种田野工作方式的转变或许不会使自己距离想得到的答案更近。打个比方来说,有一个醉汉在路上遗失了家门钥匙,而他选择在路灯下面找钥匙,因为路灯下面更加明亮,但是其实他的钥匙可能并不在这里。不过在这次与指导老师的谈话后,笔者倒是更加坚定:企业组织消失和单位社区解体是我们理解东北社会变迁以及东北当下社会的非常重要的环节。而为了理解当下的东北社会,研究者需要直面这样一个挑战:当组织载体消失之后,为“幽灵”画像。

三、变迁中的社会与个体生命

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间,对东北社会而言,变化是常态。虽然政策、制度、工业组织、经济结构都在变化,但是仍有大量经历过这一系列变迁的普通个体留在当地。剧烈的社会变迁总是要通过影响具体环境中真实的家庭和个人来产生作用。而在迅速且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个体的常规生活方式常常与社会环境之间产生不协调或者断裂之处,因而需要重新对自我和他人进行定位以重建生活目标并适应新的地位。换言之,个体在历史的当下行动,是一连串的面对危机并寻求新的适应方式和解决方案的动态过程。笔者开始认识到,政策的变化速度远远快于人们的反应速度,正式制度的宏观变迁和社会底蕴的切实变化是错位的,而恰恰是经历变迁的个体成了连接过去和当下的载体。在大环境的巨变中,普通人的个体生命历程才是理解社会变迁和当下的最终抓手。

因此,笔者最终选择回归了以人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并在田野调查的中后期明确地将代际中的个体作为一个突破点。代际是考察经历快速变迁的人群的一个有效分析工具,一代人在社会与历史过程中具有共同位置,会经历相似的历史过程,具有相似的经验,并进而共享思想和行动的某种特定形式。每一代人从其所处的历史世界中都会获得独特的世界观和生活哲学,这在快速变化的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而每一个世代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他们内部的共同性,还在于他们在历史中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我们把当下社会视为按代际分层的社会,仍然存活的不同代际的个体会持续地参与区域社会的塑造。比如,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婴儿潮”一代来说,他们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长在六七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初期参加工作,经历了90年代末的工厂解体,现在已经退休或者面临退休。他们既完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种种变迁,也同时是当下东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东北社会的转型而言,很多重要的历史延续和变革都发生在这一代人身上。

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开始更加有意地借鉴芝加哥学派托马斯和兹南尼基在波兰农民研究中运用的生活历史研究法(the life study method),这一方法要求被研究者提供生活故事的文献资料并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Thomas and Znaniecki, 1918)。具体而言,生活历史研究法关注每一代人特有的生命历程,试图通过每一个个体在生命

历程的不同阶段的历史行动,以及个体性的历史塑造,去勾勒出社会变迁的过程。在生活史访谈中,笔者重点关注受访者在社会剧烈变化时期的生活经历,以及如何对重大生活事件做出决定。具体而言,笔者会让受访者回答如下问题:哪年上学,受教育情况如何?哪年参加工作,为什么选择这个单位,而不是另外一个?在进了单位之后,为什么会从事这样一个工种,而不是另外的工种?当单位开始显现出经营困难的时候,是选择离开还是选择继续留在单位?离开单位之后,从事了什么样的后续工作?等等。在访谈的最后,笔者还会询问他们当下对于政府、市场、商人、福利制度的看法。

同时,在理解个体性的历史形成时,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将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运用到对以个人生命历程为刻度的时间轴的历史时刻分析中,关注每个生命阶段个体行动中的意义创造。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对不同历史时间点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进行重构。因此,笔者会尽量精确地去描绘不同时期地方社会的结构背景,从而将个体生命的展开放置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中。正如渠敬东(2019)所说:“任何个案都处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由内而外地生成多重的社会关联,因而对于各种脉络做多重的记录和描画,即是起步的工作。”对于我国的一个特定区域来说,从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改革开放时期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具体轨迹会受到在地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市场经济发展形式的影响。因此,在对于东北社会的考察中,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全国性的结构与制度变迁泛泛而谈,而是要先让政策变化、制度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和组织变化落地并且将它们描摹出来。

为了将这样一种区域历史感描绘出来,笔者做了几个方向的尝试。首先尝试从档案以及地方文献入手,进行历史脉络的构建。但是在地方档案馆查阅档案效率较低,这主要与地方档案馆组织档案和调取档案的方式有关^①。与地方档案馆保存的档案相比,笔者的经验是,各种地方志、各工厂编的厂志和地方报纸是比较有效的材料。因为工厂在20世纪80年代的效益普遍不错,每家工厂都特别热衷于编纂自己的厂志。沈阳很多大大小小的工厂都编过一本终结于1985年的厂志。而从90年代开始,由于工厂效益开始下滑,整理好的厂志材料较少。对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地方报纸则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沈阳日报》中的报道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对于社会的种种面向的扫描:地方报纸会有不同的版面,首版一般是领导人或者重大政策的报道,后面的版面会针对一些地方企业的改革进展进行报道,一些版面还会选登当时思想界对于市场改革的讨论。

在田野工作临近收尾的阶段,笔者看到了一个大型工厂跨越60年的完整档案,

^① 地方档案馆中的档案大多是按照行政机构整理的,比如机械局、冶金局、沈阳市政府等。档案使用者需要先选择一个行政机构的档案,然后档案管理人员会提供这个相应行政机构的档案名录,使用者按照这个档案名录,再选择要调取哪一本档案,写在小纸条上,写好之后,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会集中调档。在经历过几次这样的流程之后,笔者会有一种挫败感,这是因为使用者事先看不到档案的内容,因此并不清楚档案中到底记载哪些信息,经常等到调档结束真正看到这份档案后才发现档案提供的信息是高度破碎的,很多时候用处甚微。

其中包括计划经济时期、市场改革时期以及破产重整时期的文件材料。不得不说,能在田野工作后期看到这样完整的档案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笔者当时已经对于沈阳大大小小的工厂的改革史和不同代际个体的生命史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但由于材料来源分散,有一些政策和改革的时间节点并不是非常确定。而单一工厂的完整档案的材料组织是以特定工业企业为中心的,将各种相关部门的公文和通知整合到一起,不仅提供了企业内部的改革时间线,对于政策文件的整合也会提供一条确实的宏观改革时间线。这些档案材料帮助笔者校准了很多当时不确定的时间节点,在宏观的改革时间下理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地方组织变革时间框架。这样的一个更加准确的时间框架能够更好地帮助笔者确定合适的改革关键时刻(critical juncture)和结构变迁的转折点,重建不同时期的社会结构和背景,以及普通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所面临的机会结构和意义创造。

四、反思与余论

费孝通(2009)在晚年强调,社会学应该基于本学科的视角和学术传统,来开展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而社会学视角对于精神世界的研究,应该将精神世界与社会变迁和运动的机制联系起来,避免简单的“还原论”。笔者在博士论文中,想要用东北地区研究回答的理论谜题(theoretical puzzle)^①便是:如何通过普通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命经历,来探求东北这一特定区域的地方文化形成与重构,以及东北人的精神气质变化?这背后的核心理论关怀是:我们怎么样通过个体生命去理解“现在”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历史构建。然而,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述,研究与写作过程远没有想象中那般容易。首先,对于经验和理论谜题的打磨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伴随了几乎所有的田野工作和写作环节。其次,对于地域文化和人的精神气质变化的考察不能与对结构、组织和制度变化的考察分离开来,而在田野调查的进程中,如何选择合适的切入点、收集足够的材料,并获得对全局的把握以及分析锐利度,则是需要反复试探与琢磨的。最后,针对东北社会的转型这一公共议题,社会学真正的分析优势究竟是什么,能够提供哪些新的线索,也是需要时刻自省的。

综上所述,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尝试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地域社会的动态分析视角。而这样一种对于地域的文化特征的历时性分析,对产业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模式选择有着重要启示。当前,中国社会的区域复杂性对于社会治理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而好的社会治理实践需要建立在对地方社会更加深刻的认识的基础上。“东北现象”的凸显以及“东北问题”的难以破解正是说明,在经济指标之外,地方社会的种种文化特征影响着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我们只有对不同地区的制度与组织变迁、社会结构性质、普通人的生活与意义世界等进行系统性的整体分析,才能因地制宜地选择并落实合适的经济发展政策和社会治理模式,重

^① 有关经验谜题、理论谜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讨论,详见:Abbott(2014)。

新释放区域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吉林课题组. (2017-09-11) [2022-04-15]. 《吉林报告》引发全国大讨论的总结(上篇)[EB/OL]. <https://mp.weixin.qq.com/s/rV5QtXtFm7Cr5A6e1DFfYA>.
- 费孝通. 2009.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M]//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438-465.
- Fei X T. 2009. Extending the traditional boundaries of sociology [M]//*Fei Xiaotong's Complete Works (Vol. XVII)*. Hohhot: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438-465. (in Chinese)
- 李培林, 张翼. 2003. 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5): 86-101.
- Li P L, Zhang Y. 2003. From life's adversity: "Human capital failure" in re-employing laid-off workers in North China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5): 86-101. (in Chinese)
- 林火灿. 2017-09-18(9). 振兴东北离不开“有为政府有力政策”[N]. 经济日报.
- 刘平. 2004. “人力资本失灵”现象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从李培林、张翼在东北的发现谈起[J]. 中国社会科学, (3): 147-148.
- Liu P. 2004. "Human capital failure" phenomenon and the northeast old industrial base society[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 147-148. (in Chinese)
- 南都社论. 2016-10-22(AA02). 非体制改革不能救东北[N]. 南方都市报.
- 渠敬东. 2019. 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J]. 社会, 39(1): 1-36.
- Qu J D. 2019. Case studies towards the analysis of total social construc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9(1): 1-36. (in Chinese)
- 孙立平, 郭于华. 2010. 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 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实际运作的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Sun L P, Guo Y H. 2010. Institution and Subject in Practice: Studies o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Laid-off[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in Chinese)
- 田毅鹏. 2004. “典型单位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社区发展的制约[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 97-102.
- Tian Y P. 2004. Restriction of "work unit system"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in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of northeast[J].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97-102. (in Chinese)
- 王红茹. 2017. 林毅夫团队《吉林报告》引发大讨论: 东北要不要补轻纺工业短板? [J]. 中国经济周刊, (35): 31-36.
- Wang H R. 2017. Lin Yifu team's "Jilin report" triggers a big debate: Should Northeast China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light textile industry? [J]. *China Economic*

- Weekly*, (35): 31-36. (in Chinese)
- 吴清军. 2010. 国企改制中工人的内部分化及其行动策略[J]. 社会, 30(6): 65-89.
- Wu Q J. 2010. Workers'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and action strategies under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0(6): 65-89. (in Chinese)
- Abbott A. 2014. *Digital Paper: A Manual for Research and Writing with Library and Internet Material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e C K. 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he Economist. (2014-12-30) [2022-04-15]. Back in the cold [EB/OL].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14/12/30/back-in-the-cold>.
- Thomas W I, Znaniecki F. 1918.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Monograph of an Immigrant Group*[M]. Boston: The Gorham Press.
- Yan Y X. 2003.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M].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ndividual Lives in a Changing Society: Using Northeast China as an Example

XIE W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Northeast (Dongbei)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experiencing a challenging period of transition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cademic and policy circles have discussed how to revive the Dongbei economy on numerous occasions. The complex social changes in the area, however, make purely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nsufficient. To better understand Dongbei's complex transformation, academics can benefit from a comprehensive sociological framework. By tracing the author's puzzle-raising, fieldwork, and theorization processes as she wrote her doctoral dissertation on Dongbei, the paper reflects on qualitative methods for studying social change. The paper proposes combining life study methods with macro-historical analysis when studying societie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 Such a combination can link changes in ethos with changes in societal structur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such a dynamic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o-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social governance models.

Keywords: individual life; social change; Northeast Chin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投稿日期: 2022/2/17 送审日期: 2022/2/17 录用日期: 2022/6/16